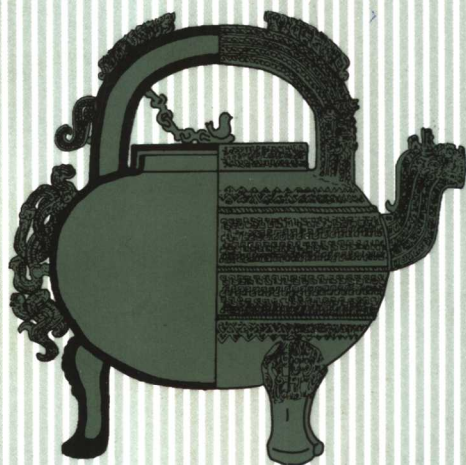


Antiquities of Eastern Asia

东亚古物

[B 卷]

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 编



文物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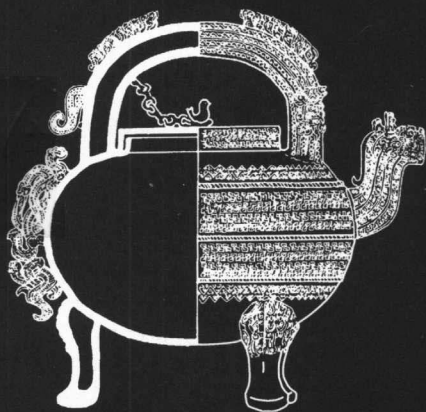
Antiquities of Eastern Asia

东亚古物

[B 卷]

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 编

王仁湘 周裕兴 主编



文物出版社

责任印制 张道奇

责任编辑 张征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亚古物 .B 卷/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编.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7.5

ISBN 978-7-5010-2048-5

I. 东… II. 南… III. 文物-考古-东亚-文集

IV. K883.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33753 号

东 亚 古 物 [B 卷]

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 编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 2 号楼)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北京安泰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1/16 印张: 23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10-2048-5

定价: 128.00 元

目 录

汤惠生	类型学的类型——考古类型学方法论的回顾与检讨	1
牟永抗	南方地区古玉考古学研究进展与成果之我见	44
霍 巍	试论西藏西部象泉河流域新发现的几处大石遗迹	54
邓 聪	从东亚考古学谈澳门黑沙遗址	67
丛德新	新疆罗布泊小河 5 号墓地及相关遗存的初步考察	82
胡颖芳	宁镇地区土墩墓的年代研究	100
李一全	峡江地区汉墓初探	129
萧 兵	巴楚文化的碰撞——以荆门出土“海神戈”为例	180
时瑞宝	秦都咸阳遗址出土的陈爰金版	190
邵 立	东汉中晚期山东祠堂像石的配置及意义——以宋山小祠堂和 武梁祠为个案	194
何志国	摇钱树佛像的初步研究	206
周裕兴	“香薰”与“薰炉”辨	227
董新林	辽代耶律羽之墓中的两件鎏金银器小议	232
朴淳发	汉城时期（早期）百济与中国交往之一例——对梦村土城 出土金属带饰的考察	241
张寅成	百济义慈王和古代的东北亚	249
刘建国	田野考古中 GPS 测量数据的整理与应用	265

2 东亚古物

李峰著 徐峰译 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	273
程学忠 贵州天柱出水青铜器调查征集报告	295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青海省西宁市陶家寨汉墓 2002 年发掘简报	311

类型学的类型

——考古类型学方法论的回顾与检讨

汤惠生

我们的分类将成为——尽可能地使之成为——生物的谱系，那时将真的显示出所谓“创造的计划”了。当分类有了确定目的之时，它的法则将趋于简单。

——达尔文《物种的起源》

英语“类型”(type)一词来自希腊语“typos”，意思是“一击”、“击打留下的痕迹”、“图像”、“模式”等。“类型”(type)一词早期多用于基督教和建筑学，而对该词最早的解释出现在19世纪上半叶的法语建筑史词典中。法国建筑史学家夸特莱梅勒·德·昆西(Quatremère de Quincy)分别于1825年和1832年在他主编的《方法论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 méthodique)最后一卷和《历史词典》(Dictionnaire historique)中对“类型”一词进行定义，现代英语中该词的义项正是袭用了昆西的定义。

19世纪下半叶瑞典人奥斯卡·蒙特柳斯(Oscar Montelius)第一次运用类型学(typology)对欧洲史前工具进行年代学研究。他的类型学理论假设在人工制品设计上的变化是一个逐渐递增过程；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设计，而且临近的文化相互之间是有影响的。根据当时流行的文化历史学理论方法，蒙特柳斯建构了一个文化间相互影响和相对年代确定的模式。这样一旦其中某一两个人工制品的绝对年代被确定后，其余的相对年代亦可确定。类型学首次作为一种方法论用于考古学的断代与编年。1903年，蒙特柳斯出版了《古代东方和欧洲的文化分期》第1卷《类型学方法论》(*Die älteren Kulturperioden im Orient und Europa I. Die typologische Methode*)，以北欧和地中海地区的青铜斧、青铜剑、扣针等为例，详尽而系统地阐述了类型学原理。从此，类型学作为方法论不仅用于考古学，同时也被广泛用于神学、建筑学、社会学、历史学、环境地理等其他学科领域。

20世纪30年代中期，蒙特柳斯的《类型学方法论》被介绍到中国^[1]。40年代中国

考古学家们开始运用和实践类型学,从此,类型学便作为中国考古学最主要的方法论之一发展起来,而且逐步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类型学方法论。类型学与地层学一起,被比喻成为中国近代考古这架马车上的两只轮子^[2]。中国考古类型学方法论至今已有 60 多年的历史了,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目前仍作为中国考古学最主要方法论的类型学都经历了哪些发展与变化,很值得我们总结与检讨。

一 国外考古类型学的回顾

(一) 蒙特柳斯的类型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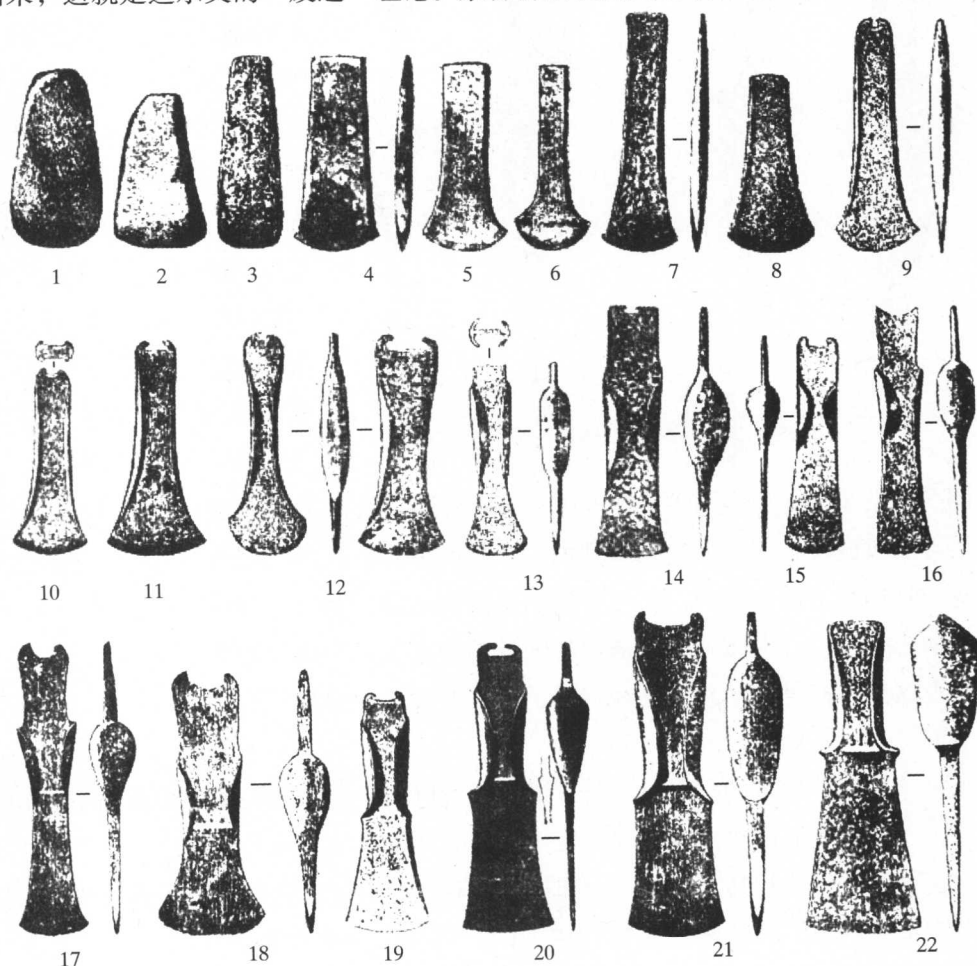
自从 1840 年达尔文出版了他的《物种的起源》之后,进化论便作为一种时尚的学术理论而风靡全球,尤其是欧洲和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各个学科竞相引用和运用进化论。鲁伯克(John Lubbock)将石器时代分成“旧石器”和“新石器”两个时代;泰勒(Edward B. Tylor)根据进化论原理研究史前文化,将史前分成“蒙昧”(Savagery)、“野蛮”(Barbarism)和“文明”(Civilization)三个阶段,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后来又将泰勒的三期论扩展为七个阶段。蒙特柳斯就是在这样一个进化论思想统治欧洲学术界的背景下,完善了考古类型学。

进化论为生物科学建立了历史观,给分类学指出了明确的目的。进化论说明了地球上形形色色的生物种类,都是历史的产物,具有或近或远的亲缘关系,渊源于共同的原始祖型,是同一祖型的分支后裔。分类的目的,就是要分析种类之间的这个历史渊源,据以分门别类,反映生物的自然系谱。进化论给分类学以明确的目的要求。针对林奈的分类,达尔文的分类被称为进化分类学(又称进化系统学)。自此之后,分类学上便系统树盛行、谱系分析成风^[3]。蒙氏的类型学体系完全建立在达尔文的进化论基础之上,既然人类的发展是一个逐渐的进化过程,那么人类所使用的工具同样也经历了一个逐渐的进化过程^[4]。首次将人类的文化产品视同生物界的有机物:一个文化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之间是递进的、相关的和有连续性的。具体来讲,蒙特柳斯在做北欧青铜斧年代研究时便完整地移植了达尔文关于用进废退的变异原则和谱系树^[5]的分类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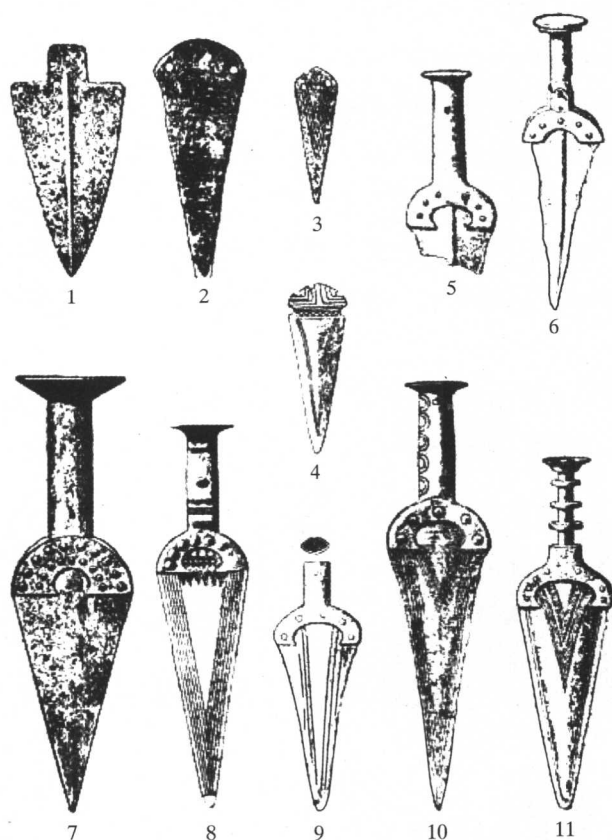
我们先来看看“用进”的例子。蒙氏云:“某一组列有视其他一组列进化为早者,如形式学‘锐感的’(empfindlich)组列中,例若留针(衣服针),乃由形状易于变化的品物所成,其变形之故乃因种种关系而生。其自身大小容易变化,饰有特征的纹样的品物,其组列更为锐感的,这样的组列视变化不易的东西,其兴味也不殊,这所以考古学者认为有重要的意义者。”^[6]

蒙特柳斯把北欧的石斧和青铜斧放在一起，根据安柄部位的变化，排列出一个发展和演变序列。从图一中我们可以看到：1~3 为石斧，被绑或楔入木或角套管的柄上使用；4~11 为青铜斧，两边逐渐增高和内卷的侧棱说明了安柄技术和安装方式的进步，使斧可以更加牢固地安装在柄上；12~22 我们可以看到青铜斧两边的侧棱是如何逐渐发展起来，最终变成固定斧柄的套筒。石斧或青铜斧根据安柄方式而易于发生地变化的两侧，就是蒙特柳斯所谓的“锐感”部位。蒙氏关于斧的发展序列可以说是一个进化过程，在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锐感”部位是如何发展和进化的，而且它们之间的相对年代关系也就一目了然了。

不过，“锐感”部位不一定都是在进化的形式中发展，有的则是通过退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达尔文的“废退”理论。蒙特柳斯在研究北欧和意大利的青铜剑时，发



图一 北欧石斧和青铜斧的进化序列



图二 北欧青铜剑的进化序列

现了考古学中的事例。也就是说某些器物的某些部位已经没有功能上的意义，但这些部位仍保持了原来风格：“考古学者的形式学研究——与自然科学者的研究方法相同——须特别注意其‘失能的’（rudimentär）成体。此即指曾含有机能的器具的某一部分已次第失其实用的意义之谓。从前的‘器官’（organ）因为用不着了工作而发生变化，好容易才把它看出来了。像这样失能的成体其自身兴味的现象，关于那朝着什么方向而生的问题却含有很大的意义。某种器官尚有机能的品物，视既已失能的品物，其时代当更古远，甚明。”^[7]

图二中的1~4皆为早期的青铜剑。这个时期剑的尾端表明剑身与剑柄是分离的，剑身很可能镶嵌在木制或骨角制的剑柄上，剑尾端的小孔是固定剑身与剑尾用的；5~6的剑身与剑柄均为青铜制的，但两者依然是分别制作，然后再镶嵌在一起；7~11的剑身与剑柄为一体，一次铸就，但剑柄与剑身结合部位的纹饰依然保留分体铆嵌的特征。也就是说这些镶嵌铆钉的功能已经丧失，但其形式依然保留下来，一如达尔文生物学上的“遗型”。

无论“锐感”部位的“进化”与“退化”，都反映出文化产品中如同生命一样的进化过程，一个客观的递次发展过程，使得我们的文化产品如同人类进化一样，通过其基本性状特征，便可获知其时代了。一如达尔文对进化过程中变异和选择的重视，蒙特柳斯对器物发展过程中的变化也是极为关注的，他认为对变异和选择的研究乃是建立考古序列——如同生物学上的谱系树——的基础。正如牛津大学大众科学教授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所说的：“全球性的达尔文主义是一个变异和选择的复制过程，

任何由于选择而产生的变异都会被认为是进化”^[8]。从某种意义上讲,蒙特柳斯不仅开创了考古类型学,同时也为进化论考古学奠定了基础,进化论考古学由此作为一个流派而发展起来^[9]。

(二) 皮特里的序列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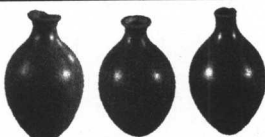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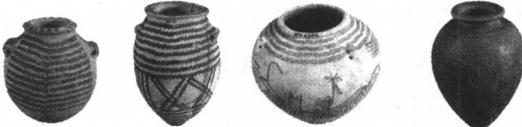
应该是19世纪末英国著名的考古学家皮特里(W.M.Flinders Petri),第一次在考古界使用现代意义上的类型学方法论,即用序列法(seriation)进行相对年代的确定和类型学意义的交叉断代(cross dating)法对绝对年代的确定^[10]。

1898~1899年,皮特里负责距埃及尼罗河畔底比斯古城(Thebes)不远的纳卡达(Naqada)墓地的发掘。墓地占地约17英亩,共3000多座埃及前王朝的墓葬。大多数墓葬为三角形土坑墓,深约4英尺。该墓地有三类墓葬,其形制与随葬品均不相同。皮特里注意到A类墓中某些出土器物与B类墓出土的部分器物相似;而B类墓中某些器物又跟C类墓中的部分器物相似,通过对这些出土器物的分类、比较和排队,皮特里找出了墓葬之间的早晚时代关系,建立起墓葬的年代顺序^[11]。

皮特里把纳克达陶器分成9个类型:黑顶器(black-topped)、磨光红陶(polished red)、奇异造型陶器(fancy forms)、交叉线纹陶器(cross-lined)、刻纹黑陶(incised black)、鸡冠耳陶器(wavy-handled)、彩陶(decorated)、夹砂粗陶(rough-faced)、晚期陶器(late)。

皮特里将鸡冠耳陶器作为陶器分类的标准,因为该器的时代特征非常明显,早期为鼓腹球形,晚期逐渐变为上下一样狭长的柱状。皮特里发现与鸡冠耳器共出的陶器并不多,尤其交叉线纹等陶器从不与鸡冠耳器共存。皮特里由此认为鸡冠耳陶器与其他类型的陶器当分属不同性质和不同时代的文化产品。他由此将出土鸡冠耳器和其他类型陶器的900座墓葬分成两个系列。将每个墓葬的出土器物,特别是陶器,及其特征写在小纸条上,然后对纸条进行整理与排队。最后他将两个系列各分成51组,分组号从30~80。从第79组开始进入第一王朝;而第30组以前的分组号是皮特里专门为以后发现更早的埃及考古文化预留的编号(图三)^[12]。最后他又以鸡冠耳陶器最早出现的时代为界,将整个纳克达墓地分成两期:纳克达一期(Naqada I),也叫阿姆拉蒂安期(Amratian),纳克达二期(Naqada II),也叫戈尔金期(Gerzean)。在以后的发掘中,皮特里又追加了一期,共三期,亦即开始我们提到的A、B、C三类墓葬。

不过这仅仅是一个相对年代的序列,那么绝对年代又如何确定呢?皮特里在发掘纳克达墓地时,去迈锡尼做过短期访问。迈锡尼的一些东西与他在埃及发掘的很相似,但埃及的有确切纪年属于埃及早期王朝的东西,这次访问使他认识到他在埃及发掘的

分组号	年代	鸡冠耳器	其他类型陶器	
30	BC 4000			
31 └─ 34				
35 └─ 42				
43 └─ 50				
51 └─ 62				
63 └─ 71				
72 └─ 80	BC 3000			

图三 皮特里对纳克达陶器的分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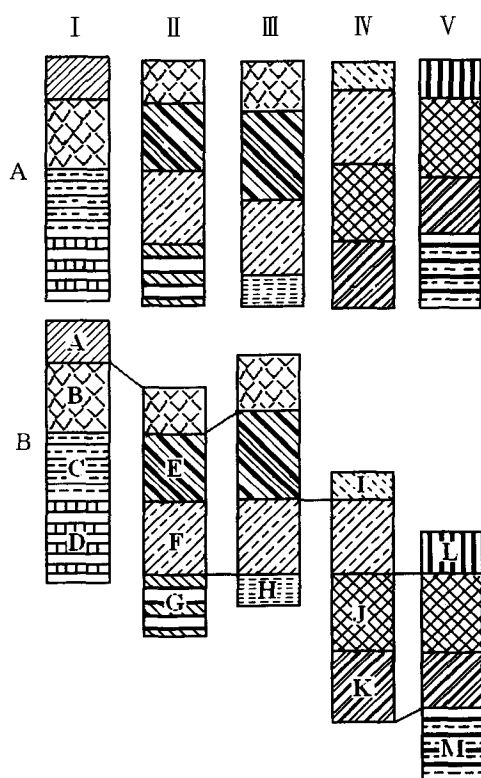
晚期东西，也就是他序列中的 72~80 组，也同样属于早期王朝。如是，他的序列的绝对年代，也基本可以确定。这就是皮特里的序列断代 (Sequence dating)，在这个分类中包括了时间 (分组) 和空间 (两个系列) 两个方面的内容。

(三) 美国的类型学与序列法

尽管皮特里开创了序列断代法，但序列法的充分发展，应该在 20 世纪的美国。以福特 (James A. Ford)、斯宾登 (Herbert J. Spinden) 以及詹姆斯·迪兹 (James F. Deetz) 等人为代表的美国考古学家使皮特里的序列法更为精致化、理论化以及使用范围的扩大化。詹姆斯·迪兹用他的“战舰曲线” (battleship curves) 来对序列交叉断代法做出理论上的注释，从而使其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序列法：“流行的东西是短暂的。汽车尾部的鳍尾、呼啦圈、摇摆舞等，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同一时代出现，但后来均被新的车型、娱乐器械和舞步所替代。如果我们通过图表来看一下一年中喜欢跳摇摆舞的总人数比率，那么比例最大时，图表中的曲线也就是最高处。从摇摆舞的兴起到被其他舞所代替，在图表上所呈现出的曲线形状好似一艘从空中俯视的战舰外形：开始狭窄，像舰尾；跳摇摆舞的人数增多后，曲线变宽了，人数最多时像舰腹；最后慢慢人数减少了，到了船头，又像舰尾那样狭窄了……这种明显的流行‘形状’，便是我们序列法的基础。序列法是相对年代的断代方法。根据这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呈现出的‘战舰曲线’理论，我们便可将各种考古文化排列出它们的先后顺序。同时也可以使我们在缺少地层关系的情况下，将单一文化内涵的遗迹按时间顺序排出一个序列来。”^[13]

皮特里只是对器物的序列断代，而美国学派的序列法除了对器物进行交叉断代外，也可以此方法用于对多个发掘地点地层和器物的整理。例如有 5 个发掘地点，这 5 个地点中地层堆积情况彼此都不相同，但亦有相同的层位 (图四, A)。5 个地点的 20 个地层经过序列法整理和重新排列后，便形成了一个从 A 层到 M 层的有时间顺序的序列 (图四, B)。

詹姆斯·迪兹于 1967 年出版了不到十万字的《考古学初阶》 (Invitation to Archaeology)，这虽然是本小册子，但其更为广泛和持久的影响力远远超



图四 使用序列交叉断代法对地层的排列

过了他在普利西玛 (La Purisima)、新英格兰以及普利茅斯殖民地 (Plymouth Colony) 等发掘点的大部头发掘报告。我们在此完整地援引他在该书中列举的实例,从而具体了解一下美国的序列法:

“我们通过一个例子来观察一下考古学家是如何在一系列遗址中运用序列法来获得相对年代的。我们假设一个在斯摩基 (Smoky) 河谷住几百年的印第安柯楚玛 (Coehuma) 部落。这个村落遗址在 30 英里长的河流两岸被发现。每十年或二十年柯楚玛人都将迁移一次。所以他们的文化堆积不厚,且不连续。当他们停留在斯摩基谷地的期间,柯楚玛人制造出三种陶器:红陶白彩、白陶黑彩和灰陶刻划纹。当柯楚玛人第一次来到这个谷地时,他们所制造的仅仅是刻划纹陶。大约一个世纪以后,他们开始制造黑彩白陶。当黑彩白陶发展到鼎盛时期,便逐渐代替了刻划纹陶。以后,刻划纹陶便不再被制作。这时候柯楚玛人又发明了白彩红陶,发展到最后,又代替了黑彩白陶。到柯楚玛人被政府骑兵部队赶出这个谷地时,他们正处在白彩红陶的时代。

考古学家调查了这一带以后,发掘了九个点。每一个发掘点只有一种文化内涵,但每个发掘都包含有一个或更多的柯楚玛陶器类型。因为遗址中很多人工制品如房屋形制以及埋葬习俗等都很相似,所以考古学家有理由认为该文化是被同一部族所创造,但不同一时期。这九个发掘点所出的陶器类型百分比如下:

地 点	刻划纹陶	白陶黑彩	红陶白彩
1	100%	0	0
2	0	75%	25%
3	50%	50%	0
4	0	0	100%
5	0	25%	75%
6	75%	25%	0
7	0	100%	0
8	0	50%	50%
9	25%	75%	0

只有一个可行的方法去整理这九个发掘点,即将这三种类型放在一个可供观察其增减变化的顺序表中。在实际工作中,对每一个遗址点用一条纸带来代表,根据遗址中所出现的类型特征的变化,绘以不同宽窄的黑色条块(图五, A),然后再将这些纸带加以排队整理,根据纸带上黑色条块所呈现出的曲线,找出这三种类型陶器的时间顺序(图五, B)。

这是年代上的顺序。这种顺序的建立,是以陶器在不同时期的流行程度为基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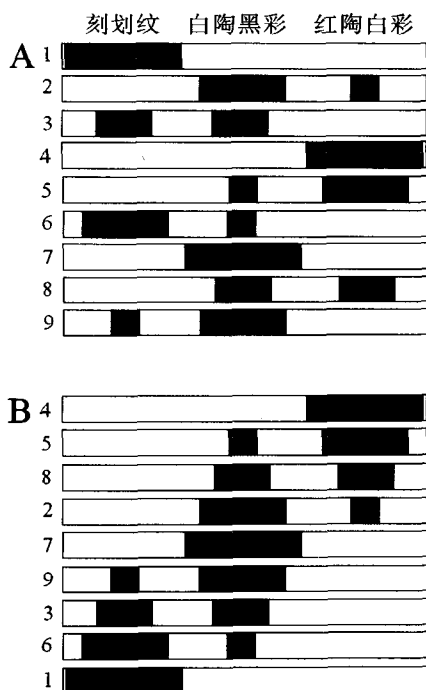
它也可使我们对于一个内涵丰富、堆积层较厚的连续遗址整理出一个相对的年代序列。

值得注意的是，序列只能被解释为一段时间内的顺序关系，但不能通过这种技术得知遗迹的绝对年代，也无法知道所有这些遗迹发展的历史有多长。要解决这个问题，则需要绝对年代测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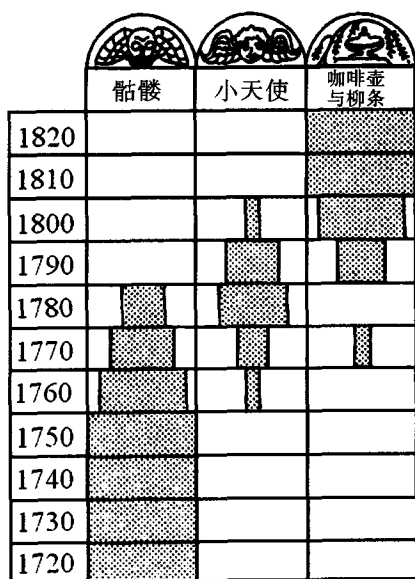
这种序列法是基于陶器类型的流行程度和根据‘战舰’理论来考虑文化类型的假说之上的。最近对新英格兰东部的 18 世纪流行的三种殖民者墓碑形制与纹饰的研究，通过对一百多座公墓的观察，证明这种假设是成立的。墓碑的年代是确定的，这便可使考古学家检验其假说的准确性。在三种装饰风格的增减过程中，完全呈现出‘战舰’形曲线。早期为骷髅纹饰，后来被小天使形象的纹饰所代替；而截止 1800 年，这种小天使纹饰则被咖啡壶加柳条纹饰所代替（图六）。

术语‘序列法’是用于判明不同生产技术的发展的方法，通过对不同生产技术发展的观察，则可对我们研究和了解堆积层在时间上的相对年代关系大有裨益。这种方法的使用以下列情况为条件：（1）人工制品的序列是以风格变化为基础；（2）这种变化以‘战舰’的曲线形式出现的；（3）单一文化的系列变化^[14]”。

正是由于詹姆斯·迪兹对于序列法的成功运用和简明透彻的阐释，序列法（seriation）大有代替类型学（typology）的趋势，特别是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美国考古界谈论类型学时更多地使用“seriation”一词，而“typology”似乎成了一个历史的或只是在涉



图五 柯楚玛陶器的类型序列



图六 新英格兰东部普利茅斯殖民者墓碑纹饰的类型序列

及非美国本土文化时才使用的词汇。在美国考古学观念中,就文本而言,“序列法”一词是可以代替“类型学”一词的:蒙特柳斯的类型学被认为是“风格序列法”(stylistic seriation),皮特里的类型学被认为是“语境序列法”(contextual seriation),詹姆斯·迪兹的方法被认为是“频率序列法”(frequency seriation)。

序列法之所以能在美国充分发展起来,与美国的考古学发展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即文化历史学(culture-history),这里的文化历史学是专门词汇,指的是人类学与历史学的结合。文化历史学的范式在20世纪统治着美国考古学,研究者想建立一个纵横的时空框架来反映史前文化和现代土著社会之间的延续性。而考古学中的序列法正是在人类学的种族序列法(phyletic seriation)带动和影响下发展起来的^[15],而且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例如90年代以后,遗传分子学中的系统发生方法论(phylogenetic methods)亦被借用到类型学研究。

类型学表现的是分类系统。考古学家们基于感觉上的相似性将材料进行分类,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考古学家完全靠经验和直觉来做类型学排队,从而建立了类型学,而事实上这些感觉上的相似性反映的是分类者的研究兴趣。即便这种兴趣是公允的或能够反映部分的客观真实,但也不具有普遍意义^[16]。尽管美国的序列法是对皮特里序列法的进一步发展,但该序列法仍然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新考古学的兴起,美国类型学研究也发生了质的变化,这就是将贝氏统计(Bayesian statistics)聚类分析(cluster analysis)、主要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缩写为PCA)、要素分析(factor analysis)等数学的精确计算方法被引入类型学研究,出现了概率序列法(incidence seriation)、充分序列法(abundance seriation)等^[17],考古学家们更多地使用电脑和专门软件^[18]制作矩阵来精确研究序列类型中的变量,使序列法和类型学不再是凭经验和直觉,而是具有了严格量化和客观性的科学意义。

(四) 博尔德的旧石器类型学

石器类型学是由法国考古学家博尔德(Francois Bordes)于1950年建立的。由于他对类型学的主要贡献是在分类技术上而不是理论上,所以我们在此只是简单介绍一下。他将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的石制工具从打制技术和器形特征两方面总结出63种类型。博尔德认为工具类型的存在与否以及在遗存中组合的差异都是由不同部族的不同文化所造成的。尽管对于博尔德这种根据类型组合的不同而进行的“部族划分”(ethnicity)理论学界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但博尔德根据形制对人工制品类型的分类及定义依然有着解释学上的价值,如将类型学视为年代排序的指示器或将类型学的组合作为研究文化间渊源关系和相互影响的工具等,都为学术界广泛接受。与皮特里的语境序列说有些

相似，他在对石器文化进行分类时不像以前那样只区别器形和打制技术的不同，而更多关注石器的组合（*assemblage*），例如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中的“工具箱”（*tool kits*）的概念。他在分类技术上的具体贡献是第一次根据风格、功能、石质和地层上的编年把莫斯特文化分成四个有时间顺序的不同类型^[19]，从而为以后的旧石器研究提供了分类的标准和比较的参照系。

二 中国考古类型学的形成与发展

从 20 世纪 40 年代开始在考古研究中实践类型学到今天形成有特色的中国考古类型学，其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我们将其分作初创期、发展期、成熟期。

（一）初创期

20 世纪初，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已经通过赫胥黎的《天演论》译本在中国传播开来。1920 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马君武的中译本《达尔文物种源始》，1922 年《民铎杂志》第 3 卷 4、5 号专门开辟了“进化论号特刊”，从不同角度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加以介绍，自此以后达尔文及其该学派的海克尔（E. Haeckel）、赫胥黎、华莱士（A. R. Wallace）等人的著作和进化思想也都被广泛地加以宣传。有了这样一个学术背景，所以中国考古类型学作为一种表现年代关系的分类学一开始同样也是在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影响下开始起步的。

类型学的探讨期是从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开始到 30 年代，其重要人物有安特生、梁思永、吴金鼎、李济等人。最早应该是安特生对中国史前陶器的分类。他的“六期说”之所以把齐家文化放在仰韶文化之前，就是根据达尔文的“简单→复杂”这一进化原则来确定的。在他看来，齐家文化的夹砂陶和素面陶远不如仰韶文化的彩陶精美^[20]。出自同样的目的，后来梁思永先生把安特生的六期扩充为十期，在仰韶文化期之前又增加了一个“后岗期”，梁思永认为后岗陶器在制作、质地及形态上也均落后于仰韶彩陶^[21]。施昕更在发掘良渚遗址时，将良渚遗址的陶器与城子崖下层的陶器进行类型比较，认识到两者都有弦纹、黑陶等共同特征，但前者装饰繁复，镂空发达，多轮制，少手制，无规范；而后者装饰较简单，少镂空，制法多样，故认为后者在时代上应早于前者^[22]。

这个时期利用达尔文的“简单→复杂”这一进化原则进行类型学研究最典型的例子是巴尔姆格伦（N. Palmgren）对半山和马厂陶器的研究，1934 年他出版了《甘肃出土的半山与马厂类型随葬陶罐》（*Kansu Mortuary Urns of the Panshan and Machang Groups*）。

巴氏在对半山陶器的类型学研究中，根据陶器有无口沿和颈部，将其分为两大类：原始类和进化类。然后根据器物的具体特征，如口、颈、耳、穿、鼻等特征把陶器分成七个组，组之下再分型。巴氏的分类同样也是遵循简单到复杂的进化法则，他认为有口、颈、耳的陶器应是无口、颈、耳的陶器之发展，在时代上前者应晚于后者。他还注意到在组与组、型与型的陶器之间，有些存在着演化关系。如第一组的I、II两型是最原始类型，第III类型可能是第V类型的演化；在第二组里，第五类型陶器形式简单，最原始，显然是其他几个类型的祖型；第三组第XI型和XII类型代表原始型，但巴氏又指出第XI型是从第II型演化而来，第XI型又发展成第XII型等等。在对马厂陶器的分类中，巴氏采取了同样的分类方法，并且在与半山的比较中，他认为马厂的许多形制和纹饰是从半山演化而来，从而成功地确定了半山与马厂之间的时代关系^[23]。陈星灿先生对巴氏的分类有着极高的评价：“可以毫不夸张地认为，巴氏1934年出版的这部著作是中国史前考古研究中的第一本类型学专著，对中国考古学界影响很大”。^[24]

不过我们应该公允地看到，这个时期所谓的类型学仅仅处于原始阶段或者称之为林奈式的分类学更准确一些，分类仅仅是为了区别，缺乏时空区分方面的明确目的，亦即缺乏类型学研究的目的。最初，梁思永先生于1930年在研究山西西阴村的仰韶陶器时，首先对若干陶片进行了形态分类。他把不同形态的口缘、器底、柄与把，分别给予一定的符号。如口缘根据外壁是否有转折的角度、外敞还是内敛，唇部趋厚程度的不同、向内或向外还是内外均凸起的差别，分用四层符号来标记之。这种分类细致到根据陶器的局部形态进行，然而正所谓拣了芝麻，丢了西瓜，这种分类无法反映器物之间的时间关系以及演变序列。

后来李济为了整理安阳殷墟出土的陶器和铜器，又提出另一种具体方法。他主张对某一种考古学文化的不同器物及其不同形态，应按照同一标准，加以归纳，给以序号编号。例如容器，先以器物最下部为圜底器、平底器、三足器、四足器诸差别，分别给以一个序号；再按上部的口径与器高的比例、器壁与底部的角度等差别，确定第二位序号；最后又以器物最大径的位置以及耳、鼻、柄、流等附着品的有无，给以第三位序号。由这三位序号构成的一个序数，就代表了某一种器物的某一个式别；同一式别内形制略有小异的标本，则可再分为若干型^[25]。按照这种方法，似乎只要一见序数的编号，就能知道器物的基本形态。使用序数之法，可以很好地区分器别，但难以记录和表达同一器别内形态差别的复杂和细微之处，从而不便于寻找及表示器物的形态变化过程，且描述颇为繁琐^[26]。后来李济在《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上篇）中谈到：“这样分目排列的办法，只具有一个极简单的目的：便于检查。”^[27]即便是在类型学研究上卓有成效的巴尔姆格伦，他的分类目的也是不明确的，正如他所说的，之所以如此分类，仅仅是